

In the 1920s and 1940s, the spark of pragmatism helped to ignite the blossoming of Chinese journalism education

Yuanyuan Li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124,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20s, moder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was in its nascent stage. At that time, John Dewey, the founder of American pragmatism, came to China to lecture. His advocacy of empiricism and democratic educational ideals deeply resonated with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reformers who were dedicated to saving the nation and promoting its survival. By the 1940s, t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had deeply integrated with the Chinese social context, driving the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practices. This study first elucidates the on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agmatism and its extension into the field of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It then summarizes the mechanisms of it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the paradigm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practice.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reconstructing pragmatist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z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considering the social condition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Keywords

pragmatism philosoph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ocial situation, localiz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20 世纪 20–40 年代实用主义火花助燃中国新闻教育的绽放

李媛媛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甘肃 兰州 730124

摘 要

在20世纪20年代, 中国现代新闻教育处于发轫阶段。当时,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奠基人杜威来华讲学, 其推崇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民主教育理念, 深深触动了那些怀抱救亡图存理想的知识精英与政治革新者。至20世纪40年代, 该哲学体系与中国社会语境深度融合互构, 推动了中国新闻教育实践的特色化发展。本研究首先阐释了实用主义思想的本体论特征及其在哲学教育领域的延伸, 接着概述了其在华传播的机理及对新闻教育实践范式的影响, 最后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现状剖析新闻教育本土化进程中实用主义思想理论的重要性以及重构的必要性。

关键词

实用主义哲学、跨文化传播、社会现状、新闻教育本土化

1 绪论

20 世纪 20-40 年代, 是中国的新民主革命时期, 中国正处于“双重危机”语境: 外部面临帝国主义殖民的压迫, 内部也深陷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断裂。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知识界以“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为旗帜, 试图通过思想启蒙来重构国民性价值体系^[1]。在此背景下,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以其“实验主义方法论”与“社会改良”主张, 成为五四知识精英嫁接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杜威访华期间, 其 200 余场演讲经《申报》《晨报》等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宣传与话语再生产, 形成了“杜威热”现象, 直接引发了新闻教育从“器物层”向“思想层”的范式转换^[2]。

【作者简介】李媛媛(2002-), 女, 中国江苏淮安人, 本科, 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

在社会知识学的分析框架下, 本研究主要深入探讨了外来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本土化移植的向性以及本土行动者基于历史语境进行选择吸纳与创造性重构对中国新闻学教育实践的各种影响。该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增进对杜威实用主义融入中国新闻教育领域进行本土话语建构的认识和理解, 进而为当下国际思想主义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思想旅行”的经典案例,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新闻教育往国际化、深层化及技术化方面的发展。

2 实用主义哲学的理论谱系及其教育延伸

2.1 理论特征

19 世纪晚期, 美国思想界孕育出一种具有革新意义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该学派的认识论根基具有独特性, 最早是由哲学家皮尔士在其奠基性论文《明晰观念的途径》(1878)中系统阐述, 这一理论框架的确立, 也标志着现代哲学发展进入了重要的转折。

实用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根植于实证主义传统的认知取向,这一认知取向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拒绝将先验性的预设作为真理的判断标准,而强调通过实践后的成果实实验证来确立认知的有效性^[1]。该主义思想体系在后面的发展中将概念的意义锚定于“可设想的实践效果”,这一原则彻底重构了传统真理观的认知范式。随后,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1907)中又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真理即效用”的命题,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效用”并不是我们认知中对于功利主义的简单计算,而是指在经验流中能够经得起持续检验的认知稳定性^[2]。再到约翰·杜威,他是一位非常有思辨胆识的实用主义者,他对笛卡尔“认为自我是一种先于语言和文化适应而存在的”实体观念进行了批判,而是用一种以自我为实践产物的说法来代替笛卡尔的观点^[4]。

实用主义的特点莫过于将思维、思想层面的设想应用于实际,知识以及真理都是行为、行动的辅助,注重实践操作,这一点与中国新闻学教育实践的理念非常相符,使初始阶段的中国新闻学教育既注重实践技术操练又坚持学术思想指导,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中带来了长远效益^[5]。

从实用主义的概念阐释、特点及发展角度出发可以很好的理解为什么实用主义可以在新文化、五四运动的时候是容易被接受,因为实用主义在思想方面类似于实验主义,主张植根于实践,而不是空谈,倡导实验和研究,从实际体验出发,从而获得价值成果,这跟孙中山先生大力提倡的“知行行易”学说具有相通性。

2.2 教育延伸

实用主义在教育思想上的延伸离不开美国学者——约翰·杜威的功劳,实用主义是由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提出的,侧重于通过“意义即效果”原则将哲学命题转化为可验证的行为准则,但其教育维度的系统性建构则完成于约翰·杜威,他是实用主义的理论上的集大成者。

在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作为十分重要组成部分的教学论让我们看到了“从中做学”的基本原则,这个教育思想是基于对传统学校教育批判,主张“教育即生活”,倡导实验精神和行动研究,也很适用于中国新闻学教育,因为它的思想内核没有改变,教学的过程应该就是“做”的过程,在转换对象并且中国化后,就可以等换成中国新闻学教育应该具有“做”的过程。再从“实践”这个词语本意角度出发可以解读为“实行、执行”的意思,也就是“做”的意思,也非常符合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实践的要求,比如:大力培养新闻学人才、成立新闻院系及研究院、开设新闻学课程等^[6]。其倡导的实验精神和行动研究也是我国新闻教育课程中的一环,新闻学教育课程在发展中也增加了许多专题采访、实地调查、新闻编辑、新闻写作等涉及行动研究和实验的教学活动,让新闻人能够脱离传统只靠“纸笔”就可以实践的模式而是转向互动式体验和线下实践的方式^[7]。

中国新闻学教育讲究的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实用主义

在中国化后,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影响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发展,那么推动中国新闻学教育实践的发展也就顺利成章了。

3 20世纪20-40年代实用主义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

3.1 约翰·杜威的中国之行:实用主义思想的传入

实用主义能够中国化以及对中国新闻教育实践产生影响,这前前后后的关联传播,都与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约翰·杜威。约翰·杜威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实用主义先前学者皮尔士和詹姆斯的受用主义哲学,但又在这个基础上,将实用主义更将全面化地整合,完善,进而推广到更多的领域,广泛应用于教育、学术研究以及实践中。

杜威携夫人和女儿一起于1919年4月30日来到中国,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也就是1919年5月1日到达上海,他们被五四运动所吸引,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返回他们的国家。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就在中国各地进行学术思想的演讲和传播,他到过将近十三个省市,共做了两百多次的演讲,他的演讲受到了中国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他的演讲经过中文翻译,随后被记录、整理出文稿,发布在各大报纸文刊上,甚至被汇编出版。杜威演讲中主张的实用主义思想被近代很多报刊进行记载、刊登,比如: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北京的《晨报》、长沙的《大公报》。从中也可以看出杜威宣传的实用主义获得了极大的推崇和传播,对于20世纪初正处于滥觞之际的中国新闻学教育可谓及时甘露,让处于迷茫之际的中国知识思想者可以参照借鉴美国、日本的思想模式,学习新闻学具体且科学的理论体系,以实验行动来改造新闻业,从而推动新闻学教育的长远发展。

3.2 杜氏学生及中国知识分子:实用主义思想的中国化探索

3.2.1 广泛推崇

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郭秉文、陶行知、蒋梦麟等都是杜威的学生,也可以说是他的信仰者,他们从美国杜威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返回中国后,都在中国教育界担任了及其重要的角色^[6]。他们深受老师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坚实地信奉着实用主义哲学观思想,和教育界人士一起在中国积极宣传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当得知杜威和夫人在日本演讲时,胡适和其他的学生就决定邀请杜威来华传授讲学,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扎根打下了基础^[7]。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非常反对以前的封建传统文化,推崇新文化,此时他们非常需要一种新的思潮来引领他们,西方强调以人为本位,为价值的实用主义有利于突破封建传统文化的牢笼,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

适应了他们民主科学的旗帜内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教育界以蔡元培为首在1912年时就已经向人们介绍了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而后与教育界的其他先进者一起在1912年后的七八年时间用文章和演讲进行宣传。知识分子和杜威弟子的行为直接促成了杜威的中国一行,加速实用主义思想的中国化。

3.2.2 探索实践

在这次的实用主义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胡适与蒋梦麟承担了关键角色,发挥了前沿先锋作用。他们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实用主义学派的嫡传学人,以教育场域为实验平台(胡氏创建现代新闻学科,蒋氏主导北大教育改革),将杜威的“实验逻辑”转化为中国的本土知识生产范式^[8]。这种双重路径的传播探索实践——既在制度层面推动了新闻教育体系革新,例如,《新教育》杂志的创办,又在话语层面重新架构了“知行关系”的伦理框架^[2],这些探索行为标志着实用主义中国化从理论引介层面走向实践创新的具体实操层面^[9]。

胡适作为杜威实用主义的极力推行者,更是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应用与探索落到实处。他在1917年回国之后变发表了著名的《归国杂感》对中国当时只注重“数量办学”却不在意根本方法上的改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其中的批判思想就运用了实用主义哲学教育的延伸,注重任何一种教育形式的完备性和实用性,而不是一以贯之的“撒网式”教学(即缺乏对性,只是按照普通的教学体系来教学,没有按照实际需求来完善教学体制)^[10]。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中国新闻报业刚刚起步时,就想通过办报传递新思想来唤醒人们,他极力倡导的白话文也对中国新闻教育走向现代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倡导白话文的创新性思想,反对专制主义教育与实用主义强调的改造创新非常相似,这是现代化的一种转变,对以往封建传统的挑战,对中国新闻教育的现代化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蒋梦麟亲自撰写《杜威人生哲学》、《杜威之道德教育》等论文来阐发杜威的紧扣“社会”展开的教育思想,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囿于课堂传授,而需构建“社会实验室”,记者应该在公共议题的参与中完成职业伦理的训练,这为中国新闻教育在研究因素(注重社会层面)、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等方面都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向。

4 社会现状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多重现代性张力,一方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暂时降低了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缝隙性机遇”,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动在“场域同构”机制下也推动了当时社会中教育场域的进步,而新闻业同属于教育内容的

组成部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再创造性实践。

另一方面,社会依旧黑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仍在继续,新文化运动构建的“德赛二先生”话语范式,与实用主义强调的实证精神和民主教育形成了“选择性亲和”,这种知识社会学的匹配效应迎合了五四新文化浪潮中对民主科学自由的追求,并为新闻教育提供了双重合法性——既满足技术现代性诉求,又契合文化现代性期待。

5 结论: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本土再创造性

本文主要研究了实用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闻教育中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轨迹(1920年至1940年期间),由发展路径可以发现:实用主义在华传播本质是一场“转义性重构”的过程(即知识精英通过有选择地吸纳与意义再生产,将其融入于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过程。),其作为元话语,既构建了新闻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又提供了具体的教学认识论,这反映出在“冲击-回应”的模式下,本土学者由被动适应到主体性自觉性的转变。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去挖掘原始档案,如燕京大学课程大纲、记者手记等,并拓展跨文化的比较视角,例如关注日本“实学”与实用主义的互动,从而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来审视新闻教育本土化的复杂脉络。

参考文献

- [1]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张静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 [2] 顾红亮.实用主义概念的多重“身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06):17-26.
- [3] 盛国荣.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思想之要义[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版(02):26-32.DOI:10.16822/j.cnki.hitskb.2009.02.004.
- [4] R.罗蒂,张金言.实用主义:过去与现在[J].国外社会科学,2000,(04):18-24.
- [5] 章清.实用主义哲学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05):75-84.
- [6]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01.
- [7] 赵玉明,郭镇之.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80年(上)[J].现代传播,1999,(02):94-100.DOI:10.19997/j.cnki.xdcb.1999.02.020
- [8] 李自璋.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再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01):37-40.
- [9] 杜威之道德教育.蒋梦麟教育论助选[M].92.
- [10] 黄书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再创造[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0,(05):1-11.DOI:10.13445/j.cnki.t.e.r.2000.05.001.